

北大往事

北大啊北大

贫穷而且精彩

小事物的精英

找不着北大

十年一觉

生命与学术

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夜游

我的北大圈子

谁比谁活得更长

穿越冰山

吹尽狂沙始到金

黑蝴蝶呓语

有一种颜色叫铭黄

爱留痕迹

青春在右爱在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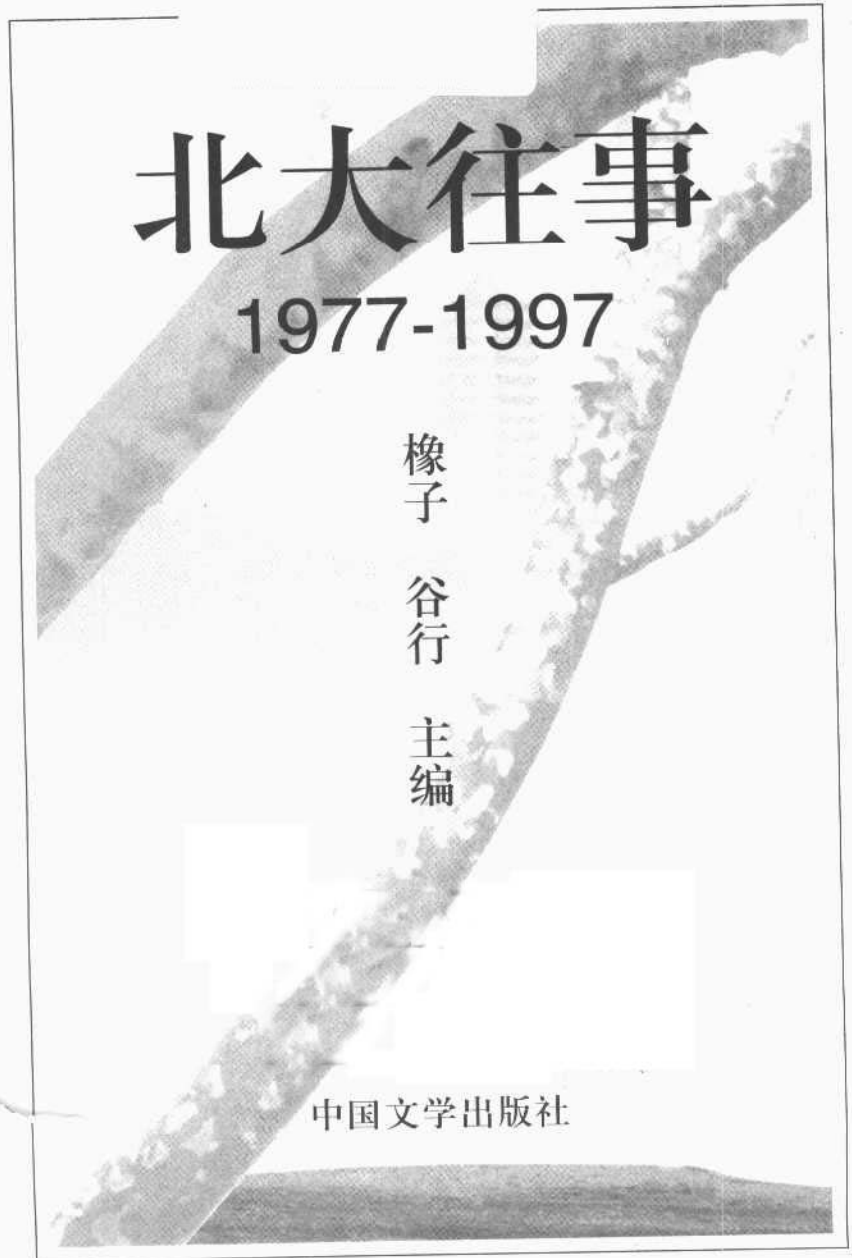
永不落幕的戏

一个口号的诞生

阿毛逸事

北大混史

中国文学出版社



北大往事

1977-1997

橡子
谷行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往事/橡子、谷行主编.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2

ISBN 7-5071-0439-7

I. 北… II. ①橡…②谷… III. 北京大学—回忆录
IV.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133 号

北大往事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72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313 千 印数:20001—40000 册

ISBN 7-5071-0439-7/I·390

定价:19.20 元

让我们暂时放弃对伟大的颂扬，
深入到幽微的往事之中。

从这些个人化的讲述里，
我们也许能找到伟大的根源。

目 录

70 年代

北大杂忆·····	岑献青(3)
一个口号的诞生·····	刘志达(17)
漫忆七八·····	马相武(23)
闲话北大·····	赵 园(37)
贫穷而且精彩·····	吴 晔(41)
我的北大圈子·····	唐师曾(51)
阿毛逸事·····	王惠民(55)
人事两茫茫·····	周立文(60)

80 年代

小事物的精英·····	西 川(67)
孤 征·····	王开林(79)

DJ70/34 V2

找不着北大	张华峰(83)
怀念故人	阿 忆(88)
诗歌的联系	麦 芒(99)
47楼207	孔庆东(105)
十年一觉	陈平原(120)
师 事	天 波(125)
生命与学术	王岳川(130)
记忆的诱惑	王 枫(143)
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蔡恒平(155)
燕园学诗琐忆	西 渡(166)
谁比谁活得更长	杜 丽(186)
有一种颜色叫铭黄	杜 丽(195)
另一种生活	燕治国(198)
梦幻燕园	高洪波(217)
想念王毅	余世存(219)
穿越冰山	橡 子(225)
吹尽狂沙始到金	橡 子(250)
北大混史	蒙 夫(257)
一封信、三个笑话和一些关键词	郭广强 蒙 夫(262)
怪斋笔记	雷 格(266)
黑蝴蝶呓语	姚 丹(271)
向死而生	周 闾(277)
一夜惘然	何 必(283)
文人之初	李 方(289)
锻炼生存	施永南(297)
与生命相约	李 毅(305)
爱留痕迹	晓 白(315)

90 年代

秋夜的烛光·····	归 一(331)
我在北大的禅事·····	祝凌云(336)
球人球事·····	李晟康(339)
我的家园·····	峻 毅(346)
青春在右爱在左·····	张 菁(352)
夜 游·····	童未央(360)
郑颖达先生二三事·····	满 丁(370)
北大啊北大·····	迟宇宙(373)
永不落幕的戏·····	王 润(389)
编后记·····	(409)

70 年代

那叫我们痛苦的大海是深沉莫测的……
我们又划着我们的断桨出发了。

北大杂忆

岑献青

一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年底考试，第二年二月就入学。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以一种迫不及待的速度重新开始。而北京大学，也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除的主人，匆匆忙忙地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新生。校园里满目都是那场革命遗留下来的痕迹，标语纸、大字报纸还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抖动。

学生宿舍也没有调整好，32楼是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宿舍，同时也是办公室所在地，办公室占了二层，一、三层是男生宿舍，女生则住在四层。

到北大后没几天，就下了一场雪。雪不大，但飘飘洒洒的，很令我这个来自边地的广西人惊讶和感动。于是我拎起热水瓶，告诉同屋的同学说：“我要下楼打水去了。”

其实是想去看雪。

直到二十年后，同学们聚在一起时，还有人拿这事当笑话说。

那个时候，我的样子一定像个村姑。

实际上，我想看的何止是雪？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所看到的，又何止是雪？

多少年来，常常有一个晨曦中的背影总在我的记忆中浮现，

那是我们宿舍的一个女生，她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悄悄地搬了一张凳子，在楼道的窗下读书，不只是读外语，还读别的教科书，甚至把一些枯燥无味的史料也背得滚瓜烂熟。有一次我们去军事博物馆参观，她居然把“四渡赤水”讲得明明白白，像是她自己渡了四次赤水似的，让我惊讶不已。

实际上，这样的背影在当时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这样的背影都会出现在未名湖边的石堤上、图书馆前的草坪里、教学楼旁的迎春花树下、山坡树林的石砌曲径中……这样读书的学生，大约也是北大校史上最特别的一届了，年纪最大的与年纪最小的同学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当了父母，有的人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当历史给了他们一个进入北大的机会时，一种生命的紧迫感便骤然而至，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也都恨不得把他们的知识在一夜间就都教给我们，每一堂课的内容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还开了许多新的专题讲座。我们真算得上是有福分的学生，在读本科时，有幸拜访过当年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杨晦先生，聆听过吴组缃、林庚、周祖谟、阴法鲁、陈贻焮等等老先生的课。而在当时还算得上“中年教师”的金开诚、袁行霈、吕乃岩、费振刚、何九盈、孙玉石、谢冕、乐黛云、周强、周先慎……等先生，不仅给我们讲课，还常常在课余时间到我们的宿舍来给同学们解疑或是和同学们聊天。我们也经常请老师们参加班里的各种活动，或者在课余三个五个地结伴上老师家请教。与老师们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古今中外，海阔天空。

那样的谈话真是一种享受，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文化的浸润，一种心灵的沟通，一种精神的传递。师生间有着一种难以言

表的和谐融洽的关系。袁行霈先生曾经很动情地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在我们毕业十五年后，孙玉石先生为我们班郭小聪的书《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们为了吮人类知识宝库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古老的和新鲜的营养，天天钻图书馆，购买和传阅每一本新出的书，讨论和争吵一些学术问题，为了听课，尽早地等在教室门口，抢位置，为此甚至挤碎了门玻璃；他们默默地在拥挤的宿舍里，在图书馆中，勤奋地爬格子，匆忙地涂写，各自做着人生前行的美丽的梦。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而周先慎先生在十几年后见到我，还会提起当初他给我们上课时，同学们总是为他准备好一暖瓶水，并且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的事情。

来北大前，我在一个小煤矿里生活了二十年，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我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外婆，还有一个在国民党伪县府任过职、又在“四清”运动初期不明不白地上吊自杀的伯父。在我三岁时，母亲被莫名其妙地划成了右派。这些林林总总的关系，使我们的家庭罩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阴影。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又成了走资派，常常被揪斗、囚禁，当我拎着饭盒去给父亲送饭，走过那些发出不怀好意笑声的造反派面前时，心里总有一种极端的恐惧。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生存状态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当我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母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当我带着这样一种经历来到北大时，我却发现我的这些所谓苦难，与许多人相比，其实真算不上什么，不少同学的父母都戴过右派帽子，很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差

不多人人都在农村插过队，在矿山干过活，在南北兵团里“战天斗地”，他们经历了生活的苦难，更经历了心灵上的苦寂和孤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了辛酸血泪的故事。同样的，我们的老师们，也在时时都处于政治中心的北大遭受了我们难以晓喻的心灵苦难。

但是，在那个时代，承受了最大苦难的却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北大使我学会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阅读苦难，认识苦难，理解苦难。

也许正因为经历过这些，我们才会一百倍、一千倍地珍惜读书的机会，没有人一味地躲在角落里舔伤口，也没有人终日都在絮絮叨叨地诉说过去，我们都认为民族的振兴将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民族做一些什么。这毕竟是带着一种特殊历史背景进入北大的学生；这一代人经历了十年文化沙漠的痛苦，那种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望、那种拼命读书的“疯狂”劲头，恐怕是现在的学生很难想象得出的。

二

当然也不是死读书，除了上课，我们还有许多有滋有味的课外活动。

我们班的同学中，有好些在上大学前就是本地小有名气的“笔杆子”，进了北大中文系的文学专业，自然更是跃跃欲试，要圆一个作家梦。尽管系里的老师一再强调“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大家还是不愿放弃这个梦想。于是便有同学张罗着成立起文学社。

许多年后，黄子平在为我的散文集作序时，这么写道：“……那是个被后来确认为‘思想解放’的年头。大学里又可以办学生

社团了，最活跃的当然又是中文系的人。班上的一些同学不少在入学前就发表过作品的，自然手痒难耐，先是组了一个‘早晨文学社’，下分小说组、诗歌组和评论组。其中小说组阵容最是雄壮，有当时已崭露头角的陈建功，还有黄蓓佳、王小平、小楂等几员女将，岑献青也不声不响地跻身其中。我因为写过几首如今读来‘愚不可及’的诗而入了诗歌组，大约是曾在花城出版社当过几个月‘借用编辑’的缘故，被推了当油印文学‘刊物’《早晨》的‘主编’，便也偶尔参加小说组的活动。其时写小说的人还时兴‘谈构思’，小说组的活动是各人在那里大谈其构思，然后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出主意甚至‘转让’细节之类。要数陈建功最热衷于‘谈构思’，不管是去饭堂还是课堂的路上，他逮住你就开始‘展开’他的构思，而且这构思一天三变，又不厌其烦地与你讨论，待到这作品发表出来，全班人几乎都已‘耳熟能详’了。别的一些人却苦于没法‘谈构思’，都说到底什么样儿只有写了出来自己才知道，……于是又有写出来的小说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眼见为实，果然谈不出构思来的也能写出好小说。……”

即便是这么地“大谈特谈”，也不过瘾，便又在32楼前办了文学社的作品专栏，用的还是那个很朝气蓬勃的名字：“早晨”，用稿纸抄了我们的“作品”张贴在上面。那真是当时校园里的一道风景，每逢吃饭时间，32楼前就挤了很多端着饭碗在那里边吃边看边评论。

油印刊物自然是自己动手，找了钢板、蜡纸、刻笔、油印机，就在宿舍里“开工”，常常是废寝忘食，干得很来劲。依然用“早晨”作刊名。装订好后，分送同学老师，还寄到外地的大学中文系“交流”，似乎还真造出点“轰动效应”来，时不时的还有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的同学“上门拜访”。

当然，办刊的经费是自筹，那时没有拉赞助一说，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有时也鼓起勇气在三角地叫卖，找回一点工本钱

来。但也有同学能出歪点子的，比如在帮着学生会往30楼里搬运办公用品时，悄悄地扛了一大筒纸就往宿舍跑，学生会的人发现了，急得大喊：“走错了走错了！”扛纸卷的人便做出悻悻的样子转回来。只是学生会的人想不到中了我们的“调虎离山”计，在他以为捉住了“作弊者”的时候，早已有人又扛了一筒纸隐进了32楼的后门。

于是下一期的《早晨》便能如期出刊了。

北大“文革”后的校园文学也许可以说是从《早晨》开始的，在它的基础上，以中文系文学专业为主，扩展到全校的文学爱好者，成立了“五四文学社”，并创办了社刊《未名湖》。我的一篇习作《阿盛》居然上了创刊号，令我对这份刊物多了一分亲近。

到北大后的第二个学期，中文系男女生宿舍分开，女生搬到31楼，生活上自然就方便多了。可另一些不方便的事又来了。譬如班级开个会，通知个事，当班干部的就要来回跑。入学后第一个新年要开文艺晚会，各班都在排练节目。我们班的男生要表演小合唱，歌名叫《山药蛋》。主持排练的班干部是女生，连拉带哄地把男生都叫到31楼来。于是那些天，常常就有一群男生在我们宿舍门前排了队扯起参差不齐的嗓门大吼：“山药蛋那个呀嘞嘿……”惹得别班的女生都从门里探出脑袋来或聚在楼道另一头远远地看，掩了嘴笑。一笑，小伙子们的声音就低了，让人听着就像那些“呀嘞嘿”的山药蛋堵在了嗓子眼里。

北大的舞会也是自我们班始兴起的。第一次在学校一体跳集体舞，还是被学生会动员去的。“文革”十几年中，没有人敢跳舞，现在忽然说要恢复了，就像一件很不得了的大事，所有的人都以一种很紧张很严肃很认真的态度和姿势来“操练”。不少留学生也前来观看和拍照。后来集体舞不再有人跳了，取而代之的是交谊舞、探戈什么的，于是31楼里陌生男孩的面孔也渐渐地多了。人们都说中文系女生有几位“舞星”，又漂亮又优雅，常

常就有外系勇敢的男孩子来相邀。记得有一个长得很秀气的男生总在星期六的傍晚出现在31楼,见了女生就问:“可以请你去跳舞么?”

北大曾经使我敬畏。从前在煤矿时,我看过关于北大学生“批林批孔”的记录片,电影里的北大学生一个个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令我们惊叹不已。如今,我居然到了从前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这么一个神圣的地方读书,听那些大名鼎鼎的老先生讲课,跟一批又聪明又有才气的人做同学,那种惶恐的心情可想而知。因为我很明白,自己学业的基础比别人不知差了多少,见识比别人不知少了多少,且不说能不能“滔滔不绝”,就我那一口“南蛮馥舌”,都能把人给听得云山雾罩的。有一回到食堂买饭,我说要半个馒头,大师傅拿起串馒头的铁钎,唰唰地给我串起八个馒头来。等到又有一次,我要买八个馒头时,大师傅却不高兴地说:“我不卖半个!”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别人的讥笑和歧视,北大给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只要你自信、努力,你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人。

实际上,我那时感觉到更多的,还是来自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学习上自不必说了,生活上也总是处处得到关照。我因从前在煤矿工作时落下胃病,来北京后饮食不适,犯得很厉害,班主任张剑福先生便将他的煤油炉给我拿来,让我煮面条吃。每每到了晚饭时候,楼道里总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煤油味,这味儿不好闻,可班上的女生都很体谅,没人说什么。倒是常常在吃过饭后上图书馆时,总有人吸溜着鼻子四下张望:“怎么会有煤油味?”

后来又有同学拿了电炉来,很小,才三百瓦,但可以烤烤馒头,热热剩饭,大冬天实在太冷,还可以取取暖。

但总要提心吊胆,明知道是违反校规的。偶尔来了查电炉的人,就像发现“鬼子进庄了”,各个宿舍都互相通报,只差没有

立起“消息树”了。不过，查电炉的人也不傻，有一回就用了从前地下党工作的方法，伪装成送校刊的人，腋下挟了一摞报纸，一头就闯进我们宿舍。恰恰那天晚上一群女生正聚在一起聊天，烧着电炉烤火。一时间我们真是无地自容，乖乖地拔下插头，听候发落。

查电炉的是行政处的工人，大约五十岁的年纪，十分严肃地拎起电线，晃着电炉，逐个地盯着我们，似乎在说：“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也的确没有什么可说的，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作“做贼心虚”！

工人师傅说：“谁的电炉？”

谁也不说话。工人师傅又说：“不说话就都跟我走一趟！”

一听这口气，我马上说：“是我的。”虽说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用，可我是班长，这事不管最后是什么结局，总要落到我头上的，何况我也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工人师傅说：“写上名字！”说完把电炉握在手里。不料电炉还很烫，他一缩手，炉盘就跌在地上摔成了几瓣。

有人忍不住“扑哧”笑起来，立刻又掩了口。师傅似乎尴尬了一下，又很认真地递过来，于是我也很认真地忍了笑往那块最大的碎片上写我的名字。

师傅却皱起眉说：“怎么会有这个姓？姓 ling 么？”

这时有位女生说了：师傅你不知道呀？这是少数民族的姓！您别以为我们成心犯校规，小岑是从中越边境来的，好几千里地呢。来到北京吃不惯食堂的饭，得了挺重的胃病，我们才凑钱给她买了这个电炉的。

别的女生也都像突然醒悟了似的，这个说师傅您不知道，她这几年喝的中药比吃的饭还多，咱不帮她，谁来帮？那个说，师傅您看，反正这电炉也摔了，交上去学校也没什么用，您何不当个好人，给她落实一回民族政策？您若非要罚款，怕是精神物质